

为党生活的人

小林多喜二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为党生活的人

〔日本〕小林多喜二著

卞立强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小林多喜二
党 生 活 者

根据东京青木书店 1953 年版翻译

封面设计：张 守 义

为党生活的人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5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62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4

197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·1979 年 9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52,000

书号 10019·2859

定价 0.27 元

我正在盥洗室里洗脸，窗外接连响起了一片脚步声。这里面有穿木底草屐的声音，也有穿鞋子的声音。另外还夹杂着大声地谈话声。看来是第二车间放工回家的工人们正好打窗子底下经过。

“还没有回去吗？”

这时须山从背后走过来，对我这么说。他是第二车间的。我转过满是肥皂泡沫的脸，冲他皱了皱眉头。——因为我早就跟须山约好了，要互相避免一块儿从工厂里回家；否则让别人看在眼里，将来万一出了事，牺牲的就不只是一个人。可是须山却经常不守信约，而且还乐呵呵地笑着说：“嗨！别发那么大脾气嘛！”不管怎么说，须山确实是一个性格开朗、惹人喜爱、叫人没法生气的家伙，所以每当这样的時候，我也只好苦笑一笑。可是现在时期是这样一个时期，我只得给他一个脸色看看；再

说今天已经约定好了，马上还要领一个新同志到一家卖年糕小豆汤的铺子里去。……但我忽然发现须山的脸可不是平常那种逗人好笑的样子。当时我一下子就意识到只有从事我们这种工作的人才会有的那种“预感”。——于是我回答他说：“嗯，马上就走。”于是三下两下就把脸洗完了。

须山见我明白了他的意思，马上改换了腔调，在我的背后说：“怎么样？去喝杯麒麟啤酒^①吧！”这句话倒是有点象平常的须山的口气，可是我马上觉得，这话里有点儿做作，包含着一种不寻常的东西。

一出厂子，须山还是走在我的前面，离开我有三四丈远。从厂子上电车道，一边是国营电车的路基，另一边是一溜排商店，中间是一条狭窄的小道。在路旁第二根电线杆子下面，站着一个便衣特务，朝我们这边瞅着。他那种似看非看的样子，实在叫人讨厌。我赶快和后面走上来的五六个人走在一起，一边说着话，一边提高警惕，用左眼梢留神着特务。那特务也似乎对他这种每天例行公事感到腻味了，露出一副厌倦的无所谓的神气。最近，他们每天就是这样监视着工人的上下工。须

① “麒麟”是啤酒的牌子名称。

山根本不把特务放在眼里，慢腾腾地迈着八字步，从他身边擦过。我一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心里觉得很好笑。

走到电车道上人多的地方，我追上了须山。他一边揉着鼻子，一边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朝四周看了看，然后跟我说：“事情有点儿奇怪……”我看着须山，他接着说：“上田跟胡子的线断了。……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我问。

“昨天。”

“有预备线^①没有？”我明知胡子是一个没有必要留“预备线”的人，但我还是这样问了。

“据说有。”

据须山说，昨天的联络是为了一件特别重要的工作，要是耽搁一天的话，就会出很大的问题。所以他们俩前天在S河、M街和A桥三个电车站之间的街头走过的时候，决定“从这儿到这儿”作为碰头的地点；奇怪的是胡子竟担心“万一出了问题不好办”，因此路上他又主动指定一家比较安全的咖啡馆，说是街上见不着，二十分钟后就到那家咖啡馆里去；并且在临分手的时候还互相

① 地下工作者在进行接头联系时，往往在约定某个时间和地点外，还规定另一个时间和地点作为“预备线”，以防万一在第一个时间和地点联系不上时，就按第二个时间、地点进行联系。

对了表。这位被我们叫作胡子的同志，是我们最上级机关的一位重要的负责人。过去他搞过近千次的联络（全部都是街头联络），其中他只迟到过两次。干我们这样的工作，这么做完全是应该的，但象他这样的同志毕竟还是很少有。再说这两次迟到，一次是因为双方都弄错了时间，而他还是准时去了；另一次是因为到了约会的那天下午，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表出了毛病。要是其他的同志，即使一两次不到，问题还不那么严重；现在是胡子没有来，而且连预备地点也没有来，这简直叫我们不敢相信。

“今天怎么样？”我问须山。

“上田说再到昨天的地点去一次。”

“几点？”

“七点。另外，去咖啡馆是七点二十分。不过，这情况我总感到很担心，所以已经和上田约好八点半碰次头。”

我算了算今天晚上自己的时间说：“那末，你九点和我见一次面。”

我们当场决定了会面的地点就分了手。临分手的时候，须山说：“胡子要是被捕了，咱就自首去！”这当然是说着玩的，可是叫人感到他简直是在说真的。我骂了

他一声“混蛋”，但他说这种话的心情我是充分理解的。因为胡子在我们同志之间非常受信任，我们把他看作是力量的源泉；说他好象是我们的灯塔，也丝毫不算过分。事实上如果没有了胡子，我们简直就没有了着落，首先连第二天的工作就不知道怎么干。当然，果真如此，也只好那样，工作还是能够坚持搞下去的。我一边走着，心里一边在想：他要是没有被捕就好了。

半路上我路过一家卖糖果的小铺子，买了一盒森永牛奶糖^①，拿着它朝家里走去。房东家的男孩子正和邻近的孩子们站在一架自动出糖果的机器前面。最近开始风行这样的机器。你放进一分铜板，按一下把手，机器里的弹丸就会跳进一个小槽，随着弹丸跳进的小槽不同，下面小孔里出来的糖果也不一样。因为花一分钱说不定能得到一分钱以上的东西，街头上每一架机器的面前都围拢着许多孩子。孩子们都瞪大着眼睛，使劲地歪着嘴，在按着机器的把手。

我哗啦哗啦地掏着口袋，摸出两个一分的铜板给了房东的孩子。这孩子起初还缩了缩手，很快就流露出满

① “森永”是牛奶糖的牌子名称。

脸的高兴。看来这孩子大概一直是站在后面看着别的孩子玩。我把刚才买来的牛奶糖也塞在孩子的口袋里，然后就回家了。

我必须赶在八点以前，把今天工厂里发生的事情写成稿子，供明天撒的传单用。已经约好稿子要在八点交给和我碰头的S。我从壁橱里拿出装着各种文件的皮包，打开了皮包上的锁。

情况是这样：我们的仓田工厂原来是一个二百来人的金属工厂；战争^①开始以后，又招收了六百名临时工。我、须山和伊藤（女同志）等同志都是那时候拿着别人的履历书打进去的。一个二百名正式工的厂子，一下子招了六百名临时工，可以想象活儿增加的多么急。仓田工厂原来是制造电线的，战争开始以后停止了电线生产，开始制造防毒面具、降落伞和飞艇外壳。最近这些活儿已经告一段落，估计六百名临时工中要裁去四百来人，所以厂子里最近尽谈论这件事。当大伙儿嚷着“要裁人了！”“要裁人了！”就有人说：“工厂里的临时工，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裁人不裁人，现在反倒是比原来讲好的期限延长，多干了半个多月。”事实上虽然比原来讲好的期

① 指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战争。

限多干了半个多月活，可是这期间尽是火烧眉毛的活儿，实在叫人受不了。就拿女工来说吧，从早上八点一直干到晚上九点，加上夜班也只挣一块零八分钱；从下午六点到九点是一小时八分钱，而吃晚饭所花的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的时间，工厂还特意为此作了精打细算，从夜班费里扣去两分到三分钱。吃晚饭的时候，我说：“看来工厂大概认为职工这类人不吃饭也可以干活吧！”跟我一块儿干活的一个临时工说：“噢，是这么一回事！……”这句话说的很俏皮，把大伙儿都逗乐了。工厂每天发放工资，把每个女工的八分钱工资零头，用一个五分的铜板加上三个一分的铜板，一份一份地发给将近四百名女工。这当然很费事，六点钟下工，为了排队领工资，甚至要等到七点。大伙儿在队伍里急得直嚷嚷：“真叫人可恨！把八分改成一毛，该省多少事呀；要不咱们吃点亏，八分改成五分得啦！”“有钱人爱财如命的牛脾气，真是咱们想象不到的。”

可是工厂却放出了空气，说是解雇临时工时，要给每人发十块钱。本来就是临时工，早就说好了可以一个子儿不付；现在又说要发钱，理由似乎是大伙儿都干的不错。这消息究竟有几分可靠，大家不是没有怀疑；可是不管怎么说，这儿一歇工，又要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

作，所以也就不知不觉地对它抱起指望来了。但是，连吃晚饭的时间也要从工资里扣除两三分钱；为了把一分的大铜板三个三个地排成堆，可以满不在乎地让几百人等上一个多小时。这样的工厂怎么可能会给六百来口人每人拿出十块钱（是十块大洋呀！）呢？！放出要发十块钱的空气，显然是包藏着工厂方面的阴谋诡计。这肯定是一种手段，放出这样的空气，目的是在解雇前防止工人波动，在决斗的关键时刻进行欺骗。

今天厂子里都在谈论这件事，我决定把最近发生的情况写明明天要撤进工厂里的传单上。大前天，大伙儿都纷纷议论要缩短发放工资时间的事。前天撤进厂里的传单，就因为及时反映了这件事（尽管是这么一件小事），在工人里面获得了好评。

我盘腿坐在桌前写起来。过不了一会儿，楼下的房东大婶上楼来了。她对我说：“刚才孩子让您破费了。谢谢您啦。”她带着从来没有过的笑容，向我道了谢，又下楼去了。干我们这样工作的人，在任何无关紧要的小事上，都注意使自己跟“普通人”一样；最忌讳的是让同住在一起的人觉得你这个人有点和别人不一样，或者怀疑你是干什么的。现在正在监狱里坚持斗争的H同志，他所受到的追捕，那我们简直无法比，饭馆、咖啡馆、

理发店、澡堂这一类地方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照片。他为了能在这样的追捕中进行活动，有一次竟带了同住的人到帝国剧院去看戏。我们还必须学会跟“普通人”说一些毫无意思的闲话，学会讨人喜欢的应酬话。不过一碰上这种事，我是最差劲的了，简直就没办法。虽然近来多少习惯了一点。……

我对大婶说：“啊呀！那么一点东西，没什么。”说完之后，臊得满脸通红。实在不高明。

尽管只不过写了两张到两张半稿纸，因为白天干了一天活，写起来确实不是一件轻松事。勉强把揭露十块钱津贴的真相写完，时间已过了七点了。一写起稿子就出汗，中间我用手巾使劲地擦了好几次脸。我把写好的稿子装进信封，在封皮上写上了一个胡诌的女人的名字，装着是一封情书的样子。七点四十分我离开家。我跟房东大婶说：“我散散步去。”平常大婶总是默不作声，今天却朝着我说：“您请吧。”果然发生了灵效！我苦笑着走到暗处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和往常一样要出门的时候，大婶说：“你这个人爱出门呀！”我吃了一惊。事实上我是每晚都出去，人家要怀疑也是该的。我心里扑通一跳，勉强笑着说：“因为，那个……”大婶笑着打圆场说：“因

为还是年轻人吧！”我才明白大婶说的不是那个意思，这才定了心。

约定八点钟会面的地方是大街电车道里面的一条后街，那里有许多街道作坊，一路上有许多商店里的买卖人和前面留着一绺头发的手艺人。我一向注意尽量使自己的装扮和所要去的地方相适应。尽管不可能做的很周到，但这件事很要紧。我们要想避免被人家怀疑盘问，就一定要把自己打扮的整整齐齐。然而象今天这样的地方，时间又是八点了，要是穿着西装，甚至拿上手杖，那反而会惹人注目，效果更加不好。所以我只穿了一身干净的和服，随便地系了一条腰带，连帽子也没戴就出来了。

喜欢摇晃右肩膀的 S，从笔直的马路的那一头走过来。他认出了我，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停了停，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拐进小胡同里去了。我跟在他的后面，同样拐了个弯，于是在另一个拐角的地方，我们并肩走到一起了。

S 听我说了前天厂子里撒了传单后的情况，又问了问各种问题，然后说：“从厂子里大家经常关心的问题出发提问题固然好，不过缺乏的是进一步从政治上提出问题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，看着S的脸，感到确实是这样。我只是陶醉于传单博得了好评，而忘记了从更高的高度来看待这些问题。

S接着说：“所以说，我们现在是在追随大家的自发情绪而行动。要想使大家从对日常生活的不满来了解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，还需要作特殊的、有计划的、而且是相当深入的努力。——让大家明白这一点，是完全必要……。”

他说：过去散发的很多反对战争的传单，具有公式化、概念化的毛病；而现在反过来了，又犯了把问题局限于经济要求的错误。由于这种右的倾向是作了群众的尾巴，所以往往暂时会获得群众的好评。因此对于“好评”，也需要慎重地加以考察。——我们一边走，一边谈着这些事情。

“说是要小心，如果象这回这样，牛头不对马嘴地乱来一气，那也没有任何好处。是倒退！过去我们就象是蒙着眼睛的马，只看到事物的一个一个的片面。”S这么说。

我们走了一会儿，进了一家咖啡馆。

“给你一封情书。”我这么说着，把稿子放在桌子下面的搁板上。

S用鼻子“嗡嗡嗡”地哼着歌曲，一边留神着女招待，一边把稿子塞进了口袋。然后他问我说：“你那边和胡子（他按了按鼻子下面）没有接上头吧？”

我把在工厂回去的路上从须山那儿听到的情况告诉了S。他故意用鼻子“嗡嗡嗡”地哼着歌曲，但集中注意听着对方说话。这是他一向的习惯。

“我这边约定是昨天六点，也断了。”

我一听这话，心里慌乱起来。

“是给抓住了吧？……”我嘴里这么说，而心里却希望他能说：“不，不会的。”

“嗯，……”S考虑了一会儿说：“他可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啊！”

我们约定，双方都要尽一切办法和胡子接上头，另外还商量了明天早晨如何把传单带进厂子，以后就分手了。

九点钟，见到须山的时候，我一看他的脸色，一切都明白了。不过也还不能说是完全绝望了。跟须山商量好，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查明胡子的下落。接着马上就分手了。——因为路上很危险，我们规定了除非是在自己的秘密住所附近联络，否则一过九点，就要停止一切活动。

和须山分手以后，我独自一个人往回走。感到胡子的事，意外沉重地压在自己的心头上。只觉得膝头发软，连呼吸也感到紧迫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边走边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。在正常环境中生活惯了的人们，也许会认为我把这时候我的这种现象说的有几分夸张和虚假，可是我们现在和外界的一切都被隔绝了，连个人多年的老朋友也完全断绝了往来，就是上一次澡堂也丝毫不能疏忽大意，而且一旦被捕，起码要蹲上六七年监狱。——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，唯一的依靠只有同志。哪怕是失去一个同志，都会感到联系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多么深厚；要是经常领导我们的同志，那就更会是这样。以前我在一个反动工会里作为反对派进行合法活动的时候，尽管也发生过这种事，但还不至于这么严重。因为不管怎么说，那时候还有种种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冲淡了这种感觉。

太田早就在我的住处等着我。——我决定不让任何人知道我的秘密住所，只是在上级的许可下，告诉了一个人（这个人就是太田）。这是因为在仓田工厂进行活动，怎么也要规定一个专人经常和我碰头。只是在外面联系，一有紧急的事情就来不及，而且也不可能充分地

把各种各样的问题说清楚。

太田是为明天带传单的事而来的。于是我把刚才和S商量的结果告诉了他，决定让他明早七点钟到国营电车T站的站台去，S将到那里去，亲手把传单交给他。

急事办完之后，我们闲谈了一会儿。我笑嘻嘻地说：“怎么样？闲扯一会儿吧。”太田笑了起来说：“拿手好戏又开场啦！”平常公事一办完，我差不多总是要兴致勃勃地说：“闲扯一会儿吧！”现在这就成了我的“拿手好戏”了。不过，原来我并不明白我为什么爱“闲扯”，最近我才发现了原因。——由于工作，我们几乎每天都和同志会面。但是这种会面，即使是在咖啡馆里也只谈公事，而且要尽量压低嗓门，不说废话；公事一完，马上就离开那里，尽快分手。一年三百六十五日，天天都是这样状况。当然，由于天天都是这样的生活状况，我已经清算了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，现在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。但是这就象有些人长期蹲拘留所，有时简直象急病突然发作似地，馋着想吃某种“好吃的东西”。我的情况大概是这种生活单调的反作用，一见到同志，就借想“闲扯”的方式表现出来。可是过着正常生活的太田，竟认为我的这种心情只不过是过去特别散漫的性格的反映；象他这样可以在啤酒店里大喝啤酒的人，当然不可